



为“全民阅读”补上一曲民风中华诵



世界上唯一能穿越时空的，是人的思想。所以，对先贤思想的尊重，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也是对历史真相的尊重。

世人皆病吾独醒

评说吕坤与《呻吟语》

朝园◎著

中国古代经历了五次“乱世”，每次大乱都出了一批枭雄，唯有晚明之乱，却出了一批勋业卓著的政论思想家。吕坤，就是代表之一。《呻吟语》喻指社会“病”了，虽是“病”中“呻吟”，亦显一代奇儒“横吞八极水，细数九牛毛”之宏微两极境界，故不失“人生圣语”之美誉。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世人皆病吾独醒

——评说吕坤与《呻吟语》

朝园 / 著

●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宫 共
封面设计：尚书堂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人皆病吾独醒：评说吕坤与《呻吟语》/朝园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
(国学书厢)
ISBN 978-7-01-013622-6

I. ①世… II. ①朝… III. ①人生哲学—中国—明代
②《呻吟语》—研究 IV. ①B24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19447号

世人皆病吾独醒——评说吕坤与《呻吟语》

SHIREN JIEBING WU DUXING——PINGSHUO LÜKUN YU SHENYINYU

朝 园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海石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7.25

字数：197千字

ISBN 978-7-01-013622-6 定价：46.00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 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 (010) 65250042

《国学书厢》序

汪高鑫

所谓“国学”，在中国古代是指最高一级的学校，《周礼·春官宗伯·乐师》说：“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也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大概到20世纪初年，“国学”一词完成了语义的现代转换，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的代名词。这种语义转换的背景，则是清末民初的西学东渐与中学转型。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多次使用“国学”一词，以与“新学”、“外学”相对举，彰显中国固有学术与外来文化的区别。此后学者多以“国学”代指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邓实就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胡适也说，国学是“中国的一切过去历史与文化”。

众所周知，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学术博大精深。因此，这门“国学”的内容之丰富，在世界历史上自然是独一无二的。按照我们先人的划分方法，它包含了经、史、子、集四大系列。具体而言，这门“国学”以先秦六经与诸子学为基础，包括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

二十四史、历代野史杂史，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以及历代医学、兵法、农学、书画、星相、数术等等众多学术门类。而“国学”的核心，则无疑是传统儒学。

“国学书厢”系列丛书的推出，便是要通过对国学中有影响的各类传世典籍作出有所选取的评说，以期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风貌，揭示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精髓。之所以“有所选取”，是因为国学的典籍浩如烟海，任何一种系列丛书，都不可能对其作出全面的评说。本丛书的选取对象，主要是以秦汉以后诸子、杂史、文论等经典作品为主。作出这样的选取，是基于相比较于四书五经、先秦诸子和二十四史等国学“大众经典”而言，秦汉以后的诸子、杂史、文论等相当数量的国学经典，长期以来并不为人们熟知，目前尚属于“小众经典”。然而这些国学典籍评说人性善恶、纵论文韬武略、参透历史玄机、洞悉政治内幕、语录警世箴言，其学术与思想价值毫不逊色于“大众经典”，它们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学术上自成“一家言”，思想上启迪后人。

编辑这套国学经典评说丛书的用意至少有两个，其一是为大众了解、学习国学经典提供方便。随着近年来“国学热”持续升温，通过学术讲堂与图书出版等多种形式，国人对四书五经、先秦诸子、二十四史等国学典籍多少已有所了解。然而这些典籍虽然浩繁，却只是国学典籍中的一部分。在秦汉以后的中国古代两千年历史中，历代都有数量众多的诸子、杂史、文

论等经典问世，它们也是中国国学典籍宝库中不可多得的宝藏。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它们相对还比较陌生。展开对这些国学经典的系统评说，有助于我们去认识和了解这部分国学经典，汲取其带给我们的思想素养和精神力量，力求使这类“小众经典”最终成为大众读物。

其二是为中国的文化总结与传承工作尽一份力量。毛泽东说过，“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当割裂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国学经典就是在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点的“珍贵品”，是一份中华民族的厚重的遗产，我们作为炎黄子孙，自当倍加珍惜，认真总结，努力传承。评说国学经典，便是一种文化整理与总结工作；而整理与总结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传承下去，使中华文化得以川流不息。

基于这样的目的，该丛书在国学经典评说方法上力求做到两点：第一是准确性。国学经典评说不是戏说，而是一项严肃认真的文化总结工作，因此，必须坚持准确性原则，尊重经典原意，阐释经典精神。为了帮助读者准确领会经典，该丛书的编集体例分为导论和正文两个部分。导论相当于一个整体性的导读，集中介绍作者生平与学术，以及所评说经典作品的学术

价值，旨在使读者对经典价值及其作者学术思想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正文则以解读和阐释经典内容和思想为主线，并将作者所处时代背景、学术实践过程、思想发展脉络融入其中，以期全面展现经典的思想价值和作者在思想实践中体现出来的精神魅力。

第二是通俗性。该丛书编纂的努力方向是使“小众经典”最终成为大众读物，既然要成为大众读物，当然其主要读者群体是非学术专业的普通大众读者。而要让大众读得懂国学经典，了解经典的学术思想，就应该摒弃学术文体与学术语言形式，努力贯彻通俗性原则。为此，该丛书的经典评说，力争做到内容上深入浅出、语言上通俗易懂，以期激发起大众读者的经典阅读兴趣。

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国学书厢丛书”，可谓眼光独到、立意新颖。相信随着经典评说系列丛书的不断推出，会激发起大众读者学习国学经典的热情，这将对传承国学、汲取民族文化素养大有裨益。

2013年11月撰于
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园

导 言

万历年间的心理自助——吕坤其人与其书

人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也是自身能动的结果。一个人是如何获得主体性的呢，即精神上如何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这是关于人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个体的独立自主，只能靠人自身的努力以及人类社会的切实的进步来达到。我国明代末年思想家吕坤，其代表作《呻吟语》，从修身哲学的点点滴滴谈起，实际上涉及“自我”和“行动”、“个体”与“社会”的深层精神问题，无异于探讨和阐述了这个立人的过程，在我国从封建王朝时代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历史阶段，解答了上述问题。在吕坤的《呻吟语》这里，呻吟，实是一个个体走向独立的过程。

今天，在河南省商丘宁陵阳驿乡境内，二零五省道以北，有一座吕坟村，吕坤墓园就坐落在村内。墓园内分几道牌坊，将墓地层层隔开，道道深进。墓碑的正面上书：明诰赠刑部尚书新吾公暨于夫人合葬墓。从中，即使一个不知就里的过路者，也可以得知坟墓里的墓主是明代的一位死后被追封为尚书的高级官员；但事实上，墓主更因为其毕生的思想和品质受到世人的敬仰。园内神道冗长，两侧芳草青青，间有座座石像、尊尊碑石夹道，呈现出一派肃穆而清新的景象，亦如墓主生前的思想。

吕坤（1536—1618），被视为我国明代末年的一位奇儒。他既是一位著作富有传世影响力的思想家，也是一位勇于实干、善

于应对、政绩显著的智者。

在吕坤的著作当中，有《呻吟语》这样的人生哲理感悟，《实政录》这样的政治治理阐发，此外还有《去伪斋集》所存诗文等，共十余种，内容涉及人文、政治、经济、刑法、军事、水利、教育、辞章、音韵、医学等多个方面。那么，对吕坤这样一位有着多个人生和思想侧面的、自诩为“新吾”、“抱独”的有明一代末年的思想家、学者、政治家，我们该怎样讲述他的生平、著述和思想、事迹，以期让读者了解其主要面目呢？

让我们不妨从他的几部作品所引发的事件和产生的影响说起吧。

吕坤写过一部《闺范》，被皇宫宠妃购入宫闱，竟然一石激起千层浪，造成了万历年间震惊朝野的“妖书案”；吕坤还写过一篇忧国忧民的《忧危疏》，等于是面对面地直接数落皇帝造成民生痛苦的诸种过失，成为他为政生涯的高潮和终点；还有，吕坤编著的一卷明代儿歌集《演小儿语》，在300年之后，受到我国现代启蒙文学家、思想家周作人（鲁迅先生的二弟）的关注，被推介给广大现代读者，从中可见吕坤在明代末年，已粗具启蒙主义思想。而吕坤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呻吟语》，作为一部语录体修身哲学教科书，包括基本的生命哲理观、修身、治学、实践、管理的各个方面，对于自然、社会和人的观察和认识，以及社会治理、人情物理、文章修辞各门类知识及见解，可以说是深入反映明末启蒙时代基本思想风貌和一个开明的思想人物心得智慧之大成的综合著作。而这个思想人物本身所具有的既追求独立自主

同时又难脱理学窠臼的矛盾，也正是其“呻吟”的心灵之所在，体现出—个民族的思想成长的裂变过程。从某种意义上，它可以与西方近代生命哲学、伦理学、心理学著作参照阅读。

万历三贤之“妖书案”

有研究者把吕坤评价为“明代一位奇儒”，这样讲是因为他卷入是非的漩涡“却能毫无损伤地摆脱”，为官多年深谙官场却不随波逐流。万历朝的“妖书案”，的确为明代万历年间—件大案，因为它关涉官闱内部历时几十年的“争国本”斗争（也就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宠妃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与宫女所生的万历长子朱常洛争太子位的斗争），牵涉到宫廷内部与朝廷上下各派系之间的利益争夺。

万历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是明代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用了48年（1573—1620年）。我国明朝末年，是一个人心躁戾的多事之秋。—方面社会上的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发端，另—方面国家朝廷的封建专制统治却更加严酷；—方面朝野上下不管为君为臣均已呈个性彰显之势，传统的礼教无法再约束人心，另—方面，专制统治的氛围却压抑了个体生长的自由空间和良性的人际疏导渠道，遂造成人心倾轧、世态严酷之险势，君臣关系紧张，派系斗争狠恶。吕坤于万历二年（1574年）39岁时中进士，以襄垣知县为仕途起点，开

始了朝廷仕途生涯。由于关心民生疾苦、政绩显著、有著作受到瞩目，而屡次迁升，至刑部左侍郎，到了晚年，他与沈鲤、郭正域同被誉为明万历年间天下“三大贤”。但是，朝廷中皇帝手下的“贤人”是不好做的，这三位廷臣都曾卷入官闱与朝中的立储之争。如郭正域就因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3月发生的“伪楚王案”与奸臣沈一贯结下仇恨；而正值朝廷乌烟瘴气、剑拔弩张之时，同年又发生了直接牵涉到已经辞官的吕坤的“妖书案”。

据《明史·吕坤传》记载，万历十八年（1590年）吕坤在任山西按察使时，曾经撰写了《闺范》四卷，首次在太原刊行。这是一本教导女子言行规范的著作，被皇宫中的内侍买入宫中，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郑贵妃在其中又加入了十二个人的内容，并作了序，交给她的伯父重新刊印这部书。这件事本来与吕坤无关，只涉及他的书，但是却被他的政敌给事中戴士衡抓住，弹劾吕坤故意向郑贵妃进献此书，“因承恩进书，结纳宫掖，包藏祸心”。吕坤对此进行了辩解。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吕坤因上奏批评时政的《忧危疏》而辞官。不久，有人为《闺范图说》写了一篇题目为《忧危竑（hóng）议》的跋，其中信口开河地说：“坤撰《闺范》，独取汉明德后者（东汉汉明帝刘庄的马皇后），后由贵人进中宫，坤以媚郑贵妃也。坤疏陈天下忧危，无事不言，独不及建储，意自可见。”这里“坤疏陈天下忧危，无事不言，独不及建储”之“疏”即吕坤所上《忧危疏》，这篇匿名的《忧危竑议》的作者将吕坤《忧危疏》的倾向与吕坤勾结后

官的嫌疑联系起来显然是牵强的无稽之谈。吕坤面临遭陷害的危机，但终得以全身无事。

吕坤从这场风波中得以平安脱身，但此事却远未平息。来历不明的《忧危竑议》言及郑贵妃欲夺太子储位事。于是郑贵妃一派怀疑此文为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全椒知县戴玉衡所作，结果神宗谪戍了此二人。几年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又出现《续忧危竑议》一文，文中又议论神宗立东宫实出于无奈，且出语诡妄，时称“妖书”。神宗对此大怒，即命东厂搜捕奸人，结果牵连众多无辜：浙党沈一贯与东林党人郭正域、沈鲤等人积怨已深，遂借此案诬陷东林党人；康丕扬上疏指出“妖书案”和“伪楚王案”同源出于医师沈令誉和琴士钟澄，沈令誉被处以酷刑，府同知胡化上书揭发训导阮明卿写妖书，后胡化又承认自己诬告阮明卿；而达观大师紫柏真可正因为要求朝廷停止征收矿税而奔走在京师各界，遭到当权者忌恨，因此被趁机诬陷，达观入狱后遭严刑拷打，自狱中归后沐浴端坐圆寂。一时间，“妖书案”致多人惨死，使得京城人人自危。后来，太子出面保全郭正域，将此案归罪于被抓获的一个无赖生员皦生光。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四月，皦生光被押赴集市刑场凌迟处死，“妖书案”就此胡乱平息。

尽现世态危乱的“妖书案”的导火索，直接牵涉到吕坤所作《闺范》及《忧危疏》，一为教女子修身立德之作，一为批评朝廷之作，却引发了朝廷、官闱、市井各隅世态危机和神经震颤，使得处于利欲的波谷浪尖上的人们呈剑拔弩张之势，可见明末社

会心理、局势和世态人心之一斑。

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吕坤学案》中对此风波的解释是：“每遇国家大议，先生持正，不为首鼠，以是小人不悦。……时国本未定，举朝方集矢于郑氏，而不悦先生者，谓可籍手中以寄祸。”身处国家和社会至高无上的权力核心地带所上演的人事争斗，无论多么云谲波诡，迷幻重重，其核心也无外乎人心私欲的昏庸腐溃，所以最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往往也是最空洞乏味的无意义事件。吕坤照亮当世的是他的实政主张，照亮后人的是他的思想足迹，“妖书案”系由吕坤的《闺范》及《忧危疏》被奸佞歪曲利用而引发，但心怀“无屋漏功夫，做不得宇宙事业”、“横吞八极水，细数九牛毛”之宏微两极境界的吕坤，独可以身陷急流而保全自身，真可谓另一种“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乃至被后世称为“奇儒”，我们从这桩震惊明万历年间的“妖书案”中，可见吕坤身处的环境势态的险恶及其为人处世高度智慧之一斑。

一生为官之《忧危疏》

河南商丘，自古为孕育中华古代文明的摇篮，吕坤生于商丘宁陵，他出生这年为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年），去世这年为神宗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一生经历了嘉靖、隆庆、万历三个皇帝。

吕坤的祖上是怎样迁到宁陵的呢？

明太祖朱元璋以来，吕坤的祖上还被强迫姓了一段时间的“李”姓，直到吕坤这里才纠正过来，这又是怎么回事？这里面有一个掌故。据吕坤所撰《自纂墓志铭》记载，吕坤的祖上在宋元以前本来居住在洛阳，元朝末年为洛阳郊区一户菜农，在朱元璋平定天下后因为军功而被授官，但这位祖上不愿为官，明太祖朱元璋就奖赏给他银子并写下圣旨，免除他家族的赋税徭役，但在圣旨末尾却误将“吕”姓写为“李”姓。从此这户吕家人就被迫姓李二百年，直至万历六年（1578年）吕坤在吏部任职时才上奏朝廷，申请将“李”姓改回了“吕”姓。洪武（朱元璋年号）初年，吕坤的祖上迁徙到商丘宁陵居住，成为当地一户富裕人家。

商丘的历史源远流长，据说为孔子祖先的故里，庄子、墨子的家乡，也是范仲淹等众多历史名人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吕坤就出生在这样一片思想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地上。吕坤的父亲吕得胜别号近溪，渔隐闲翁，具有开明思想，重视儿童教育，作有《小儿语》、《女小儿语》，对吕坤产生很大影响。吕得胜崇尚东晋陶潜、宋代林逋，有鄙弃富贵、归隐自然之志。吕坤还有一位伯父，吕官，是嘉靖年间的贡生，曾任河北一地的主簿，主管一县的粮税和户籍，但他不愿意与舞弊钻营的胥吏们为伍，到任才三天就隐退回乡了。

吕坤从小读书就崭露聪颖，他六岁入里塾就读，十二岁应试时

表现出惊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宁陵县志·吕坤传》有记载曰：

坤六岁从里师学，读《论语》首篇，问六“信”字同异。入梵语，客有索对。者曰：“泥土地。”坤应声曰：“铁金刚。”自幼颖异类如此。十二岁就试，邑侯疑其文不出己，复试以《放告》二字为题。坤破云：“君子欲无讼，故先听讼焉。”邑侯奇之。

这段记载包括三件逸事。首先，《论语》首篇为《学而》篇，其中有六处“信”字，如下：

1. 曾子曰：“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2.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3.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4.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5.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6.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吕坤学习《论语》，要追究这六个“信”字的不同含义，这种钻研精神是我们今天学习《论语》的学生应该学习的。

吕坤入佛寺，以“铁金刚”对他人的“泥土地”，不仅对仗工整，而且刚柔互济，显露出早慧的才华。

十二岁参加县里的考试，邑侯怀疑他的文章由别人代笔，于

是又以《放告》一题考他。“放告”，即当时官府每月定期升堂受理案件，即诉讼之意。吕坤在该文的开头破题曰：君子要想使民无讼，必须首先听他们诉讼些什么。可见吕坤熟读并理解了孔子的“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以及朱熹的“圣人不以听讼为难，而以使民无讼为贵”，并且将圣人的话本末倒置，强调弄清诉讼本身内里的来龙去脉，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这，体现出与古代圣人不同的另一种务实的侧重点，就事论事解决问题的侧重点，从伦理转向心理的侧重点。

十五岁时，吕坤作《夜气铭》、《招良心诗》（后者存世），为研读宋明性理之学的心得自励之作，《招良心诗》全文如下：

天王狩何之，游乐无终已。安宅蹲虎豺，灵台生荆棘。四望不可招，门閭日徒倚。出门无所亲，况乃千万里。谁与念饥寒，为君悲琐尾。迢迢远游子，岁暮皆归矣。君行何时远，怀君日如年。我家无主翁，勍敌满郊原。须臾见远车，不日不夜间。相看疑醉梦，喜极泪阑干。为君清宫阙，为君树屏翰。衣君红罗襦，食君以琅玕。转盼与君依，跬步与君旋。小臣敢献规，无纳左右言。五官近跋扈，倒持太阿权。桓灵我天君，君何不悟焉？所愿挽乾纲，商高于周宣。赫赫中兴主，百司敢后先。天位多覬覦，莽操咫尺间。身贵慎微行，噬脐悔则难。

少年时代的吕坤不仅聪颖好学，而且表现出善于谋事。也是在他十二岁这年，他的母亲因病失明，吕坤为安慰母亲“乃召瞽妇弦歌以娱之”。他招集来盲人妇女弹奏演唱以娱乐失明的母

亲，叫她开心解闷，获得安慰，此举不能说不智，此心不能说不精纯仁孝。古语说，早慧容易早熟难，吕坤不仅自幼聪颖，而且很早就成为通情达理的有心人。

嘉靖四十年(1561年)，26岁的吕坤中举，为河南乡试第三名。第二年入京会试于礼部，未中。此后几年当中，他先后经历了父亲病故，母亲病故。隆庆五年(1571年)他在母亲重病情况下勉强被催迫赴京应试，考试期间母亲病故，所以他虽然通过了礼部的考试，但因为回家守制，没有参加进一步的廷试。居丧期间在家乡授徒。万历二年(1574年)，39岁的吕坤入京应殿试，以三甲第五十名赐同进士出身，被任命为山西潞安府襄垣县知县，从此踏上仕途。

《明史·吕坤传》载有一语：“为襄垣知县，有异政。”

《洛学编》一书记载，当时襄垣河水决堤，淹没农田房舍，吕坤带领民众抢救粮食，设立河仓，极受民众拥戴。

两年后，他调任大同知府。对于犯下人命案的豪绅，依法处治，拒绝其官员亲戚的求情。此事被记入黄宗羲《明儒学案》。

万历八年(1580年)，他开始到吏部任职。万历十五年(1587年)出任山东济南道右参政。第二年赶上山东大饥，吕坤为赈济灾情操劳得消瘦憔悴，受到民众拥戴。到济南后，他还四处收养盲人，教给他们说书、弹唱的技艺，让他们能够自食其力，又资助盲人结为夫妇。吕坤一生注意救助盲人、残疾人，也出于他自幼对失明的母亲的同情。万历十八年(1590年)，他